

## 「終戰」那一天，之後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在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而結束。但對於很多人來說，終戰並非一個固定的日期，而是一段更遙遠、更艱辛的旅途之始。終戰的那一天，並不是單一的情緒。有人困惑，有人悲傷，也有人終於鬆了一口氣。長時間的戰爭，使「結束」成為所有人共同的渴望，希望親人能回家、生命能被保住、被迫中斷的生活與夢想，似乎終於有機會繼續。戰爭結束後的日子，人們開始各自找尋被奪走的青春、勞動、語言、關係，或那個在戰火中被迫暫停的自己。

終戰，對許多人而言，它更像是一個必須重新定位人生的起點。有人迎向回家之路，有人卻尚未知道下一步該往何處去。對於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與日治時期離鄉背井投入飛機製造的臺灣高座少年工而言，終戰意味著返鄉、失落、空白與重新開始，也象徵戰後臺灣第一代面對世界改變的年輕身影。透過他們的故事，展覽從「終戰那一天」出發，開啟一段關於找尋、重來與選擇的旅程。因為終戰之後的那一天，才是真正未知的開始。

臺灣人還有很多故事等待述說，等待書寫。例如在二戰期間為日本國犧牲奉獻的臺籍日本兵，在戰後得不到應有的肯認，他們夾在中華民國、臺灣認同以及日本帝國子民的政治縫隙當中，猶如永遠困在終戰那一天的人們。例如簡茂松先生，在戰爭時期應募擔任日軍在婆羅洲的「戰俘監視員」，戰後被國際法庭當作戰犯起訴，判刑五年。出獄之後被遣返回日本，才發現日本不承認他的經歷，拒絕補償，連戰爭時期的工資也領不出來。而臺灣當時正處於威權統治時期下，親友也勸說他不得回到臺灣，否則可能遭到政治迫害。簡茂松只好留在日本，以開計程車為業，不斷向日本政府追索他應得的戰爭補償，卻始終被拒於門外。

而來自花蓮的原住民史尼育晤（Suniuo），日本名為中村輝夫，漢名為李光輝。他1943年加入日軍的「高砂義勇隊」，駐紮在印尼的摩羅泰島上，後來因為盟軍登陸該島，史尼育晤在倉皇撤退當中，與同袍走散，最後不知所終，所有人包含軍隊本身，都判定他失蹤陣亡了。沒想到，在終戰的31年後，1974年，印尼當地發現叢林裡有一名「野人」，行蹤相當隱密。經過印尼政府調查後，發現是當年失散史尼育晤，才將他遣返回臺灣家鄉。史尼育晤比起留在菲律賓的小野田寬郎，還更晚了幾個月「投降」，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後一名的日本帝國軍人。但遺憾的是，史尼育晤回到家鄉之後，難以適應家鄉巨大的改變，經常抽煙消愁，五年後即因肺癌過世。

戰爭的創傷，無論是哪一個族群的人，都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陰影。而戰後幾十年間，臺灣歷史就是不斷試圖壓抑或扭轉戰爭經驗、私下縫合及填補內心的空洞、忘卻失去親人、生離死別的哀慟，努力在新時代活下來的人間劇場。

## —— 臺灣第一位飛行員

1917年臺中練兵場，來自豐原的16歲的少年謝文達，看著美國飛行員亞瑟·史密斯（Arthur Roy Smith）的飛行表演，當史密斯駕駛著飛機劃破雲朵，在空間翻飛遨翔之際，讓日本與臺灣觀眾驚呼連連。此時少年謝文達心中洶湧澎湃，暗自許下願望：「長大後，一定要當飛行員！」

謝文達於臺中高等普通學校（今臺中一中）畢業後，遠赴日本千葉的「伊藤飛行機研究所」留學，成為臺灣第一名飛行員，也是日本第一批有飛機駕駛執照的人。1920年，謝文達終於圓夢，他駕駛著飛機「新高號」，回到故鄉，同樣也是在臺中練兵場進行飛行表演。

當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民族自決」的浪潮，東亞也爆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韓國的三一運動等等，謝文達在日本也受到這股氣氛影響，開始閱讀相關書籍，想為殖民地的同胞做一點事情。同時，臺灣也有一群有識人士，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開始推動「臺灣議

會設置請願運動」，希望臺灣能有自己的民選議會，逐漸推動殖民地的自治進程。這群志士也於1921年組成「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希望以文化教育的方式來推動殖民地的啟蒙運動，謝文達也是文協創始會員。

1920年後，謝文達原本的飛機「新高號」因老舊不堪使用，需要再訂製一臺新的飛機。臺灣總督府及鄉親相當熱情，發起募資活動，全臺灣一共捐贈了2.5萬圓，給謝文達購買新的飛機，謝文達為了感謝總督府及鄉親的熱情慷慨，於是將這臺新飛機命名為「臺北號」。

## —— 民主自治夢

1923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的伙伴們來到東京，要向日本政府提出臺灣議會的訴求。謝文達也熱血沸騰，義不容辭要幫請願運動來宣傳。於是他駕駛著臺北號，飛行在東京上空，由助手協助撒下上萬張傳單，上面寫著「給臺灣人議會吧！」，反對臺灣總督府的獨裁統治。這些傳單飄落在東京街頭，每一張都承載著殖民地對自由平等的渴望。那一刻，謝文達不僅是臺灣第一位飛行員，也是臺灣人自治之夢的領航者。

然而，這場飛行也讓他付出了代價，原本總督府預計提供的贊助費及工作被取消了，他也被日本飛行界所排擠。面對日本政府的施壓，謝文達被迫離開臺灣，到中國擔任飛行員。雖然臺灣人遨翔天際、自由自主的夢想，短暫落空了，但歷史不會忘記，謝文達與在東京上空灑下傳單，露出的驕傲微笑，以及那一段陽光明媚、夢想燦爛的永恆時刻。

## —— 警報響起

1938年，一批從中國武漢飛抵臺灣的飛機群，在臺北松山及新竹機場投下了上百枚炸彈，造成38人傷亡、40架飛機損毀，臺灣正式被捲入戰爭的漩渦之中。到了1942年，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後，臺灣人才開始被動員上戰場、進入到全民備戰的狀態。

## 炸彈從天而降

太平洋戰爭尾聲，以美軍為主的盟軍，雖然沒有登陸臺灣，但也派B-24、B-29轟炸機對臺灣進行空襲。起先在1944年的時候，盟軍都只是優先攻擊軍事及戰略物資地區，到了隔年，盟軍亟欲儘速終結戰爭，開始針對臺灣各大城市進行全面轟炸。例如在1945年3月1日，41架B-24轟炸機來到臺南市區上空，投下數百磅炸彈及燃燒彈，臺南市區瞬間燃起滔天烈焰。

空襲警報！空襲警報！空襲警報！

阮阿公空襲的時，早就已經跋落山跤。

阮阿媽的豬牢，予您燒甲臭火焦。

阮阿爸上班的糖廠，去予掃甲一空一隙。

做田的，攏嘛走去覘佇樹仔跤。（伍佰《空襲警報》）

臺灣人在猛烈空襲之下，遭遇究竟如何？以在臺南非常有名望的，曾經參加過文協以及臺灣民眾黨的韓石泉醫生為例：空襲當下，他受徵召到其他醫院救援傷患。而韓醫師的宅邸（兼診所，今民權路「韓內科」）也遭到炸彈炸毀，其中一顆砲彈直接貫穿屋頂，在中庭爆炸，診所幾乎遭破壞殆盡，幸而家人都即時躲進防空壕中，倖免於難。不過韓醫師的女兒韓淑英第一時間跟著女子救護隊出門救災，一直到傍晚都還沒回來。韓石泉相當緊張，空襲結束後，在殘破的斷壁殘垣當中，徹夜尋找女兒的身影。第二天早上，韓石泉在診所旁的瓦礫堆當中，尋獲了韓淑英的遺體，他上半身早已被燒得焦黑，下半身則埋在瓦礫堆當中。韓石泉忍住傷痛，帶著一家大小到本淵寮（安南區安中路三段附近）重新開業，持續協助市民重建家園。

## 臺北大空襲

兩個多月後，5月31日，一百多架B-24轟炸機壓到臺北上空，投下300多噸炸藥，天火驟降，瞬間帶來地獄景象，奪走了800條左右的人命，而整座臺北城，也幾乎被炸成廢墟。根據盟軍統計，太平洋戰爭當中，臺灣因空襲死亡的人數高達6100人。前臺大醫院教授張寬敏回憶，當時他正在學生隊服

役，從郊區丘陵上看到整座臺北城的慘況，飛機從總督府、臺大醫院開始轟炸，炸彈落下就燒起很高的火焰，緊接著就捲起黑、黃褐色的濃煙，整個場景猶如「羅馬城的末日」。而他家（蓬萊醫院），也被炸成焦黑的危樓，幸好家人躲在防空壕當中，才避過這場劫難。

作家東方白在自傳《真與美（一）：詩的回憶》中，引用父親的話語，描述當時臺北城內如地域般的景象：「我一世人不曾看過彼倪多的死人，彼一日由蓬萊國民學校對面彼間葬儀館經過，看著彼亭仔腳，一具復一具，疊到滿滿，攏是臨時用甘蔗蒲板儲的，湯流到土角一四界，十坎店外就鼻著味，鼻若沒掩咧，沒法度通由彼面前的大路經過。」如此慘絕人寰的景象，令人感到無限的哀淒。

## —— 高座少年工

1943年，在高雄港濕熱的微風中，上千名剛從公學校畢業、年僅十餘歲的臺灣少年成群結隊地踏上甲板。少年們心中懷抱著「凌雲之志」，嚮往成為像零式戰機設計師堀越二郎那樣的航空工程師，渴望前往日本半工半讀，學習當時最先進的工業技術。這趟航程對他們而言，一方面是到日本工作賺錢，擺脫貧窮的路徑；另一方面藏在心裡的，更是對飛行與機械的憧憬。

到了日本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後，他們發現了現實與夢想的巨大落差。在短短三個月的基礎訓練後，這些少年便被投入了高強度的軍事生產線，除了學習機械知識之外，也要接受嚴苛的軍事訓練。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打造日本海軍末期的防禦王牌——「雷電」戰鬥機。這群志氣高昂孩子，在戰時物資短缺與盟軍空襲的雙重威脅下，展現了驚人的韌性與精確度，他們的生產效率並不輸給成年的日本工人。而東俊賢也因為優異的表現，受到長官賞識，特別參與了特攻飛機「櫻花」（自殺式飛機）的生產線。直到戰爭結束，這群臺灣少年組裝出了128架「雷電」戰機。而數十位少年工在異鄉的工廠與宿舍中，不幸死於盟軍的機槍與炸彈下。東俊賢也親眼目睹了東京大空襲之後的慘狀，舉目四望，全部都是破碎燒焦的屍體及建築物的廢墟，完全不是初抵日本時，所見聞的熱鬧大都會。

1945年日本投降後，海軍工廠隨即關閉，倖存的少年們自力更生，還有一段時期，因為沒有了工資，少年們飢餓無比，只能去農田裡偷摘農民的作物裹腹，如此渡過了數個月艱辛的歲月，才分批返回故鄉臺灣。直到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這群少年工的故事，才開始漸漸被世人所知。